

中国思想史

张岂之 主编

西北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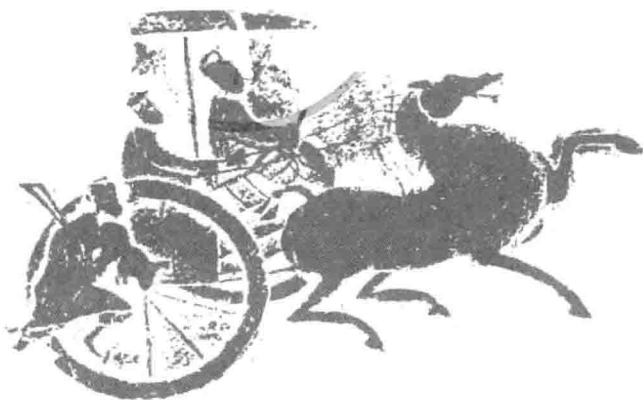
上卷



(上卷)

中国思想史

张岂之 主编



西北大学出版社

主 编

张岂之

初版执笔者

张岂之 刘宝才 龚 杰 任大援 李晓东

修订版执笔者

张岂之 龚 杰 刘文瑞 张茂泽 陈战峰 夏绍熙

《中国思想史》2011年修订版新序

《中国思想史》一书于1989年6月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1992年,我们对此书(77万字)加以缩写(46万字),以同样书名,仍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2003年缩写本出了第二版。以上两种版本都是按照大学历史学硕士生教材的要求去写的。

2002年我应高等教育出版社之邀,和几位朋友重新写了一本《中国思想文化史》教材,2006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此书的《序言》中有这样的话:“在本书撰写前,在设计全书的框架时,我们着眼于这样两点:一是中国思想文化的特色;二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创新性。”全书力求以文化传承与创新作为一个中心加以阐述。

从时间上计算,我们从1988年开始编著《中国思想史》,到今年(2011年)已有20多年;在这段时间里,我和合作的朋友们不但有了较多的大学教学实践经验,而且在中国思想史学术研究上也有了一些新认识,将它归结到一点,就是:大学人文学科研究生(主要是硕士研究生)的教材要有自己的特色,不同于大学本科生的专业教材;有新的研究成果(不论是学术界还是教材编著者自己的)展现。没有创新,教材的生命力就会受到影响,不能只在“简要”“提炼”上下工夫,还要有相当的学术厚度;不是人云亦云,而是有编著者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研究成果,也就是说要有学术特色。它不仅仅是教材,同时也具有学术专著的特色,在某些重要的学

术问题上不受篇幅的限制,力求作比较深入的阐述,以便在学术讨论中较全面地阐释自己的论点。教材可以是众人研究成果的汇集,但专著主要是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

由于有以上的理解,我计划与朋友们对《中国思想史》1989年版进行修订补充,将它修订成研究生教材参考,同时兼有学术专著性质的书稿。本书的修订用了近两年的时间,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首先,查阅全书引文,改正引证上的一些错误。是否彻底,现在不敢说,只能说尽了很大努力。其次,学术内容上有所增补。例如,关于中国思想史的社会历史背景,我国学术界在近些年来有不少成果可供参考。我们参加《中国思想史》写作的原作者和修订者在这方面的学习、研究,也有一些进展,深感有必要在修订本中加以补充,使之较为充实。再,关于中国思想史自身的一些学术问题,如关于学派间的思想分野、融会贯通、传承创新,在修订中都有一些新的补充和论述。关于中国宗教思想、近代思想的内容和演变等都是重要问题,依据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我们自己的看法,也作了不少增补。这里还要提到本书的特点之一,就是每编都有关于思想史原始资料的介绍,便于读者和思想史研究者进一步查阅。此次修订又增加了一些内容,并对主要的资料加以复核,力求准确,也用了不少时间。

依据以上所说,此次《中国思想史》的修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深深感到古人所说“学无止境”,确实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我们对中国思想史学科内涵的理解,坚持了《中国思想史》1989年版《原序》中所论述的内容。在研究方法上仍然力求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也是我们一直遵循的原则。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我们体会到:一定社会存在对于该社会上层建筑的“决定”中,并不是机械的,而是辩证的,特别是上层建筑中更加具有理论思维的部分,并不是经济基础直接决定,而是经过多种中间环节、曲折地加以反映的结果。正是依据这样的原则,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一些思想家,他们的思想难以归之于哪一个阶级的专利

品。他们的思想经过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过滤,成为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思维,他们的思想属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创造文明的过程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他们思想中的精华永远是中华民族子孙们共有的精神财富。直至今日,我们还要不断研究他们的思想,传承他们的思想精华。但是,他们毕竟是历史上的思想家,他们生活在古代历史的环境中,其思想中既有与今天时代性相符的方面,也有刻印了古代历史社会某些滞后方面的痕迹,因此,对他们的思想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在今天和未来都是必要的,既不全部肯定,也不全盘否定,以揭示历史文化发展的内在实质和现代价值,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文化创新。一部书如果没有创新面,只是老生常谈,那就失去了应有的学术价值。

还要提到,关于社会历史的分析,我们依然使用“封建社会”这个词汇,因为我们认为现在还没有更好的词汇来代替它。与中国封建社会相适应,在国家体制上是君主专制制度。在皇权统治下,社会的尊卑贵贱不可逾越,等级、阶层与宗族的影响以及各种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和宗法关系随处可见。这些在思想史上如何曲折地反映,在今天如何认识和评价,这是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应当努力加以解决的学术问题。

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基本层面,如皇帝和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但是皇权的治国方略则有所变化,并不是一个模式,而且思想文化对于社会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也会有不同的结果。例如,西汉时期的君主专制制度与秦代不完全相同,它主要实施政治、法律、思想文化的儒学化,讲仁义道德,讲国格,与秦代主要用法家理论治国有别。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年)在位54年,在他的统治下,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当时的中国以文明和富强的政治实体而闻名于世。西汉时期,中华文化、艺术都有丰硕的成果。唐代的君主专制制度不完全同于西汉,与秦代也有较大差异。唐代除实行科举选拔人才外,还重视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以及中国境内各民族融合带来的文化创造力,比

较开放。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年)在一定限度内能听取大臣们的意见。唐代还由于儒学、佛教、道教的相互对峙、融合,推动了佛教、道教的世俗化,这种世俗化的总趋势是劝人行善、慈悲为怀,这使国家的文化创造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以上的举例是想说明,即便是君主专制制度也需要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特别是在这种制度下的思想理论未必都和它完全吻合。一定社会制度与思想的矛盾,在中国历史中是经常看到的,需要学人们仔细地剖析,并作出比较准确的评价。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除皇权统治外,还有许多思想家在探索如何治国安邦,如何创造文明,如何提升国力,如何解决社会矛盾,如何选才用人,如何看待天人关系,如何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如何寻找心灵的安顿处,如何找到安身立命之所,等等。这些都为中国思想史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料。

总之,我们在《中国思想史》(修订版)中所着力勾勒、叙述的,主要是想探索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如何创造了思想文明成果,以便我们更好地加以传承和创新。

《中国思想史》1989年版撰写者为张岂之、刘宝才、龚杰、任大援、李晓东,主编为张岂之。如果没有1989年的初版,也就谈不上后来的修订本,刘宝才、任大援、李晓东虽然没有参加此次的修订,但我仍然要感谢他们在初版写作上所作出的贡献。

《中国思想史》2011年修订版两卷本参与者为张岂之教授、龚杰教授、刘文瑞教授、张茂泽教授、陈战峰副教授、夏绍熙博士,主编为张岂之。

在此次修订中,陈战峰、夏绍熙同志负责“先秦编”,龚杰同志又将我的一些关于先秦思想史的观点和文字纳入先秦时期修订版中。龚杰同志修订“秦汉编”“魏晋南北朝编”“隋唐编”“宋元编”,龚杰、张茂泽同志修订“明清编”,刘文瑞同志修订“近代编”,最后由我全部统稿。特别是龚杰同志不顾年老体弱,为本书的修订做了许多工作。尽管大家都用了很大的精力,但本书的不足之处仍然是有的,这有待将来再作修订。

修订工作比较繁杂,全书史料的查对,以及提供电子文本等,是陈战峰、夏绍熙去做的。我还要感谢西北大学出版社责任编辑们,他们的敬业精神使此书得以顺利地出版。

我还想说,一部由科研团队所写的书,它的公开出版,只是这部书学术生命的开端。它虽然面世,但它的学术生命如何,要由读者们来决定,作者并不因此而宣告一切就此结束。对于书的作者来说,应当追踪书出版以后的反映,更要不断思考书中的不足之处;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化,就会发现书中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因而修订的任务便提到日程上。修订,并不简单是文字上的修修补补,更加重要的是对于某门学科内容的深刻理解。这样,一部书由原版到再版,到修订版,就使书的质量有了相应的提高。当然,这样做会遇到不少困难,如参与人员很难集中精力,而在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中,对于修订工作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等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提倡修订这种做法,因为它能体现作者在学术研究中前进的轨迹。

张岂之

2011年7月盛暑

于西安市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1988 年原序

《中国思想史》是为高等院校中文、历史、教育、政治学等文科系的学生们编写的教材。1986年原国家教委召开文科教材项目评审会，将《中国思想史》作为重点项目之一，并确定我为该书主编。经过两年半的努力，这本教材现在和读者们见面了。

《中国思想史》教材的编著实行主编负责制。全书的结构、布局、基本观点、写法、章节目录等，我提出了具体的计划，和参加编写的朋友们商榷探讨后，由我最后确定。全部书稿我都作了修改。在主编负责的前提下，参加编写的同志们（连我共五位）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大家根据编写教材的原则和要求，从资料出发，参阅已有的成果，经过酝酿和思考，写成初稿。写作的分工，根据各人研究之所长而定。参加编写的老师大都有多年的教学经验，而且不止一次写过课堂教学讲稿，这些都属于此教材得以顺利完成的主观原因。这本教材如果能为大学文科的同学和社会自学青年所欢迎，那么，这是由于参加此书编写的每位老师都作了很大努力的结果。

为编写《中国思想史》教材，我自己作过相当长时间的摸索和尝试，教训是不少的。1958年我的老师侯外庐先生建议，为青年们编一本类似教材性质的简明扼要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小书。在侯先生指导下，我和其他几位同志写成《中国哲学史略》出版。不久，侯先生和我们执笔者都

发现,这本小书只能说是一个纲要,许多论点没有展开。1978年侯先生又建议另外编写一本适合青年阅读的关于中国思想史的书,于是就有《中国思想史纲》上、下册的出版。此书的优点暂且不谈,不足之处仍然是过于“浓缩”,青年们(包括大学生)读起来还是感到有许多困难^①。

经过这些试验,我深感要编好一本教材,必须拟订并落实编写的若干基本原则。在《中国思想史》中,我们想贯彻以下几点想法:

(1)力求结合历史发展的线索给学生们介绍中国思想史的基本内容(思潮、学派、人物、著作、思想的主要点、范畴、概念等)。中国思想史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个部分,不能脱离历史来写思想史。因此,编写时应注意从历史实际出发,把思想演变发展的历史原因、历史作用写清楚,这是体现《中国思想史》教材科学性和知识性的重要原则。

(2)力求准确地给学生们介绍关于中国思想史的基本史料,指出书名、版本、刊印时间等。还要设想,有些同学对这门学科有深入钻研的兴趣,这就需要为他们开出进一步阅览的书目。总之,这本教材颇重视中国思想史史料学成果之介绍。

(3)书中不宜凭空发议论,亦不宜作过多的引申和发挥,而力求抓住比较典型的材料,加以解释、分析,得出相应的观点,借此给学生们以方法论的启示。

(4)注意教材内容的稳定性。

(5)文字力求简洁、明白晓畅,尽量避免使用各种带有极端评价性的词句和公式化的虚文。

(6)对中国思想史中特有的范畴、名词术语,力求作准确的解释,在这一点上有和辞书相同的要求。我们在编著此书前刚刚完成《中国历史大辞典·思想史》分卷的编写,这方面的某些成果也被运用到这本教材中。

^① 尽管如此,这些书还有不少值得借鉴之处。这本教材尽量吸取了这些读物的优长和成果。

以上六点就是我们编写这本教材的基本指导思想。为贯彻这六点，我们还有其他一些更加具体的规定，这里不再赘述。不过，原则是一回事，实际的成果又是另一回事，原则是否真的得到贯彻，实际的成果是否符合上述要求，这要请读者们来鉴定，对此提出批评意见。

在这里我还想向读者指出这么一点：在我国，思想史研究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出现了《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史记·论六家之要指》《伊洛渊源录》《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理学宗传》《近思录》《性理大全》等思想史论著和资料汇编。近代不少学者对中国思想史都有某些方面的独到研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思想史研究有了崭新的面貌，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关于中国思想史的对象及范围等问题，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老一辈学者就已经作过探讨。后来许多学者就此问题发表过很有见地的意见。在这里，我不想重复这些意见。我的浅见是：思想史是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史；确切地说，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中国思想史是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理论化的中国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科学思想、法律思想、军事思想等等，都是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关于思想史，既可以作分门别类的研究，例如分别研究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法律思想、美学思想等等，也可以是综合研究。而在综合研究中，应以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为主要内容。按此要求，在中国思想史的综合研究中，更多是关于道德伦理思想、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以及宗教思想的内容，而这些也是本书的重点。

关于中国思想史的学习和研究，最好能注意这样几个方面：

(1) 将思想史学习研究与社会史的学习研究相结合。任何一种社会思潮和思想体系的产生，都有社会历史的原因，不是凭空出现的，因此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中应当注意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2) 注意社会思潮的研究。所谓思潮，就是一个历史时期思想领域

内的主要倾向。思潮往往集中反映出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经济与思想的相互联系。中国思想史的思潮是接连不断涌现的。在春秋战国时期,主要表现为诸子之学;在汉代,主要表现为经学;魏晋时期则为玄学;隋唐时期主要是佛教的传入和佛教的中国化;宋以后是理学;清代是考据之学;近代则是中学与西学的关系。

(3)学习研究思想史应注意科学技术史的成果。中国科学史的一些特有的范畴、概念,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既是科学技术成果的概括,又是中国思想升华的结晶。如“道”“气”“阴”“阳”这些范畴,就是在概括当时天文学、数学、医学、农学等自然科学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范畴又推动了中国古代理论思维的发展。古代的理论思维虽然是朴素的,但它不是先验观念,也不是普通的日常意识,而是一种巧妙地运用概念的艺术,或称之为综合各种科学成果的科学抽象。

(4)思想史应研究思想源流和演变。对于各个思想学派的兴衰变化、学派间的相互辩论和承袭融合,前代思想家对于后世的影响以及后代思想家对于前代的继承和发展,这些都是思想史中的重要内容。

(5)在思想史的学习和研究中,应加强对各种思想学派和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的理解,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思想的演变和发展是相当复杂的,对一位思想家来说,早期思想有可能和晚期思想不同;即使在同一时期,他自己的言论也可能会有不少矛盾之处,这些都要作全面的研究。

关于中国思想史的特点问题,我不想在这里展开篇幅加以论述,这要请读者们在读完这本教材后独立地进行归纳和分析。这里只是简括地提出一些论点,供读者们参考。关于中国思想史的特点,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学术界对此有各种看法,并没有定论。在我看来,首先,中国思想史重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自然哲学的分量较少,思想家们在论述自然哲学时,有不少是道德伦理思想的扩大和延伸。这在中国儒学思想中表现得格外明显。为什么道德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中成为主要部分,我们在这本教材中试图从社会史和思想史的演变和发展中加以详

细的论述。其次,中国思想史重辩证思维。古代的思想家们观察自然和社会现象,概括出许多理论观点,包含有丰富的辩证思维。战国时期诸子之学如此,后来儒家、道家、佛学诸思想体系也无不如此。可以说中国古代思想是辩证思维的宝库。这一点我们在教材中也力求作细致的剖析。再次,中国思想史重“天人和諧”的思维方式。尽管“天人和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天与人相通之点则是相同的。作为中国思想史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学力求把人间的道德律令扩大为天的道德律令,并试图说明:以人为中心的天、地、人的社会和自然的结构模式都被道德律令所支配。儒学外的其他思想学派,特别是道家学派,也从不同的途径去寻求天人和諧的理论,从而展现出多种理论形式,显示了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特有风貌,这一点我们在教材中也作了较详细的分析。最后,中国思想史重经学形式,许多思想家们托“圣人”而立言,通过注解经书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很少独立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因此,中国思想史和经学史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在这本教材中从思想史的角度对中国经学的若干问题试着作了一些分析。

关于思想的历史作用问题,需作细致的分析。概括言之,历史上任何一种产生过影响的思想体系,都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社会作用,而政治作用只是社会作用中的一部分,因此不能以政治作用来代替其整个社会作用,也不能把其他方面的作用都归结为政治作用。何况有些思想体系的政治作用并不明显,或者根本没有产生过有影响的政治作用。另一方面就是思想体系的理论思维的作用,这比之社会作用更加复杂,只有作深入的剖析,才能如实地阐明思想体系中各个重要的环节对于人类理论思维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在这些问题上切忌简单化。

最后,我期待着读者朋友们对此书的批评指正。

张岂之

1988年6月于西北大学

2003 年重印版序

2003 年 1 月 22 日我接到西北大学出版社负责同志电话,告诉我:《中国思想史》一书(1989 年出版)将出第二版,现已编校过半,请写一篇新序。这个消息令我高兴。《中国思想史》有 70 余万字,有朋友建议:篇幅太大,可否在此基础上加以缩写,便于大学里文史方面的硕士研究生阅读。1992 年,我和《中国思想史》的其他几位编著者写出了 40 余万字的缩写本,以相同的书名仍交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印刷了几次,这个缩写本销路不错。但有的读者来信说,只读缩写本觉得不够,希望能读到原来 70 余万字的《中国思想史》。有的在大学读硕士学位的朋友寄款来要我代他们购买这本书,可是西大出版社的书库里已没有存货。在此情况下,出版社终于下决心将此书重新校对,改正了一些误排和错字,作第二次的印刷。令我高兴的并不是自己的书又有了印刷的机会,而是在大学读硕士、博士学位的朋友以及社会上对文、史有兴趣的读者们需要较为详尽的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读物,这从一个很小的侧面反映了读者的高要求,曲折地说明人文学术也为社会所需要,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

我想说明的是,近十年中我和一些朋友以很大的精力从事中国思想史教材的编著,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本科生以及专攻文、史的研究生需要阅读一些教材,使他们有一个坚实的求学基础,我们在这方面尽微薄之力做些工作,这不但是我们做教师的义务,而且也

是我们十分乐意从事的工作。我并不认为高深的学术专著才是人文学术研究的唯一成果形式,尽心编著的教材不但可以体现学科研究的深度,而且在成果的推广方面也显示了研究的广度。只要读者朋友们欢迎,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安慰。

既然是研究生教材一类的书,在基础学科的知识 and 理论的介绍方面,我们在编著《中国思想史》一书时就不能不加倍地注意。对于历史上的思想家,我们是有选择的。我们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历史上留名的人物都有他们的思想,因此他们几乎都可以称之为思想家。这样的理解似乎太宽泛了一些。在我们看来,中国思想史是中国历史、中国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理论化的中国社会思想意识的演进史。在中国历史上给我们留下理论化的关于中国社会思想的代表人物并不太多,对他们的研究主要是依据于他们的著作,这是有史料可寻的。因此,在《中国思想史》一书中,我们以较多的篇幅介绍思想史史料。尽管如此,我们的介绍可能不太完善,这要请读者朋友们加以指正。

我在写这篇新序的时候,是2003年1月底,距此书第一版出书时已整整13个春秋。那时和我一起撰写书稿的刘宝才、龚杰教授已进入老年,任大援教授现在已是中年人,李晓东博士多年和我们没有联系,不知他在天涯海角的何处。像我这样已过古稀之年的人喜欢回忆过去,我经常想念此书的合作者们,我在这里表达对他们良好的祝愿。

张岂之

2003年1月28日

于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目 录

第一编 先秦编

| | |
|-------------------------|-----|
| 概 述 | /3 |
| 第一章 商周宗教思想 | /5 |
| 第一节 中国思想的起源 | /5 |
| 第二节 商代与西周的宗教思想 | /9 |
| 第三节 早期五行说与阴阳说 | /16 |
| 第四节 西周末年宗教思想的动摇 | /18 |
| 第二章 春秋时代的思想 | /23 |
| 第一节 春秋时代思想的两重性 | /23 |
| 第二节 春秋时代的重人、重民思想 | /27 |
| 第三节 春秋时期的阴阳五行说 | /30 |
| 第四节 春秋时代的伦理观念 | /32 |
| 第五节 《孙武兵法》的军事思想 | /35 |
| 附:孙臆和《孙臆兵法》 | /39 |
| 第三章 孔子思想 | /41 |
| 第一节 孔子创建儒家学派 | /41 |
| 第二节 孔子儒学的核心是“人学” | /44 |
| 第三节 孔子“和而不同”的会通之学 | /52 |

| | |
|---------------------------------|-------------|
| 第四节 孔子文质统一的才德思想 | /56 |
| 第五节 孔子教育实践的特点 | /59 |
| 第四章 墨子思想 | /64 |
| 第一节 墨子和墨家团体 | /64 |
| 第二节 墨子的“兼爱”“非攻”思想 | /68 |
| 第三节 墨子的“尚贤”“尚同”思想 | /70 |
| 第四节 墨子的“天志”“非命”思想 | /73 |
| 第五章 《老子》的思想学说 | /77 |
| 第一节 老子和道家学派 | /77 |
| 第二节 《老子》书中的“道” | /79 |
| 第三节 《老子》“柔弱胜刚强”的人生哲学 | /83 |
| 第四节 《老子》的“无为而治” | /86 |
| 第六章 郭店楚简、上博简与孟、荀学术 | /90 |
| 第一节 郭店楚简、上博简对性、情的看法 | /92 |
| 第二节 郭店楚简《五行》的基本思想倾向 | /100 |
| 第七章 孟子思想 | /109 |
| 第一节 孔孟之间的儒家师承关系 | /109 |
| 第二节 孟子的“仁政”说 | /112 |
| 第三节 孟子的性善说和伦理思想 | /116 |
| 第四节 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 | /122 |
| 第五节 孟子与杨、墨等学派的辩论 | /126 |
| 第八章 庄子思想与道家别派 | /129 |
| 第一节 庄子和庄子的“大宗师” | /129 |
| 第二节 庄子的“齐物”与“逍遥”思想 | /134 |
| 第三节 庄子的社会思想 | /138 |
| 第四节 战国时期的道家别派 | /142 |
| 第九章 名辩思潮 | /147 |
| 第一节 名辩思潮的形成 | /147 |
| 第二节 惠施的辩学 | /151 |